

## 對第二曲線的省思 ⊙傅錫壬

專題報導

( 上 接 一 版 專 載 )

不過誠如莫瑞森 (Morrison) 提到的、如何判斷自己經營的產業在第一條曲線上已經無利可圖，而在第二條曲線的尋找上又恰到時機，這確實是很難拿捏的。那麼我們以一如經營產業的態度，以臨淵履薄的心情，就本校何時該從第一曲並轉向第二曲線？筆者願藉此略抒一得之見：

第一、本校在四十七年的歷史發展中，從1996年開始才進入第三波。就未來學的規劃而言，本校第一波是從1950年到1980年，歷時卅年，是所謂長程規劃，而第二波是從1980年到1996年，為時十六年，也即所謂中程規劃，而第三波，在我們的發展重點上是強調以資訊化為特色，資訊化的特色就是講求「快」和「精確」，它的變化速度就如同核子反應，是做等比級數的「爆發」。如果第三波不以短程規劃就不足以成其事，更遑論在資訊化上領先其他大學了。所以筆者的預測是本校的第三波必須在三年後，也就是2000年時圓滿達成任務。溯其源，第三波始於1996年，到2000年正好是五年，在未來學的預測上，五年正好也是屬於短程規劃，如此則第一波是長程，第二波是中程，第三波正好是短程，其中是否有巧合，筆者已然大膽臆測。如果就莫瑞森 (Morrison) 的觀點而言，我們的第三波縱使有再多的革新計劃，都不能算是「第二曲線」，最多只是「組織再造」。然而莫瑞森 (Morrison) 對「組織再造」是持強烈反對態度的。如果我們是確實依循他的理論作思考的話，那麼本校的第二曲線開始的契機應是在2001年左右。再者，就環境規劃而言，本校的淡水校園和台北校園皆已面臨了硬體發展的飽和階段，而眾所期盼的蘭陽校園，恐怕也差不多在這個時候才完成硬體建設，與「第二曲線」

開始的時機似又不謀而合。

第二、基本上，教育事業和產業經營並不完全相同，教育事業有其根本，相連的生命帶，想剪下而立刻成為新事兒，並不像生理現象那麼容易，尤其教育事業的成功也非一蹴可及，前的賢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之用意也在此。而產業的結構比較單純，產品的生命週期也比較短，加之，製造出來的產品不是生命個體，要斷就可以斷、要停就可停，要另起爐灶就可另起爐灶，它完全是取決於供需來決定。所以處理教育問題是用「改革」，而解決產業問題是用「革命」，不過「改革」還停留在「組織再造」的層面，而莫瑞森（Morrison）對「改革」是反對的。他的「第二曲線」是站在「革命」的基礎上設計的。筆者強調說明這種差異，並不是反對莫瑞森（Morrison）的理論不該用在教育事業上，而是希望清楚說明教育和產業的差異，將更能掌握改革教育的契機，且讓本校更容易尋找出真正的「第二曲線」及其時機。

第三、筆者曾就一般教育及教育的行政的範疇請教專家、學者，究竟他們有沒有一套自己的理論基礎？答案並不是絕對的，他們說：基本上，許多學域的理论都是建立在哲學上，而一般教育的理論多建立在「心理學」上，稱為「教育心理學」，而教育行政的理論則往往借重「經濟學」或「管理學」〔其實管理學的理论也是大多借重於基礎科學〕。我這樣說全然沒有輕視某門學域的意思，反而是強調各種學域的相通性。我在這暫且不去批判艾恩·莫瑞森（Ian Morrison）的「第二曲線」（The second curve）是如何的深奧或淺近，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在熟讀它時，確實使我們的腦力產生了相當大的激盪與震撼，促使我們就本身職責及工作崗位上的問題重新做了許多正向或反向的思考。也唯有在這樣的反覆的思考後，才能確切的掌握本校「第二曲線」來臨的時機。誠如莫瑞森（Morrison）所說：判斷二甚麼時候該執行「第二曲線」？就連經驗十分豐富的決策

